



梁启超(1873——1929)，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幼承家教，有“神童”之称。11岁中秀才，16岁(1889年)中举人。旋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门下，遂舍弃旧学，研求新知。1895年追随康有为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又任强学会书记 主办《中外纪闻》。1896年赴上海任《时务报》主笔 著《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鼓吹变法，介绍西学，才华初露，声誉鹊起，时人将他与乃师康有为合称“康梁”。1897年去湖南，主讲时务学堂，与谭嗣同等领导的南学会相配合，倡导民权，隐言族类，培养了蔡锷等一批有用人才，对湖南学风士风的激励以及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开展，影响深广，引起统治集团和顽

固派的嫉视和排击。戊戌政变后被迫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发表《新民说》、《饮冰室自由书》等著作及《少年中国说》等著名散文，攻击清廷失政，批判传统思想，揭发社会积弊，鼓吹“政治革命”，同时宣传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又发起“文学革命”，创为新文体，影响更为深远。1905年后主张“开明专制”反对“排满共和”，受到革命派的批判，但在揭露清朝政府、宣传宪政思想等方面仍有积极贡献。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回国，组织进步党，任理事，实为党魁，并先后在袁世凯政府和段祺瑞政府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企图引导袁世凯等走上宪政轨道，因与国民党为政敌，反被袁世凯等所利用。然而在反对袁世凯和张勋复辟中他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不朽功勋。“五四”运动后脱离政界，专心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涉猎甚广，于文史两科，尤著实绩，任教清华、南开等校，造就人才甚众。

梁启超一生著述等身，包罗万象，有多种集本行世，目前仍以《饮冰室合集》较为完备。

家乡承教种远因

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即公元 1873 年 2 月 23 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之茶坑村。

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称他出生之年“，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这一组代码向我们演示了如下信息：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即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压榨掠夺，蚕食鲸吞，而清朝统治集团腐朽已极，不仅无力抵御外来侵略，反而与侵略者沆瀣一气，甚至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这样浸泡在血泊之中了。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另寻一条强国之路。但这位号称“同治中兴”的重臣以及他的后继者们，最终还是

回天无术，与世界形势比较，中国的情形反而每况愈下了。此时 欧洲、北美以及日本 通过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进一步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 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中，依靠对本国劳动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剥削，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继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并且逐步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古老的中国所面对的敌人比以前更强大、更凶恶了。当然，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他们正在准备着新的伟大斗争。

梁启超的出生地叫熊子乡茶坑村。熊字能下三点，《梁启超年谱长编》注“音奶”据云当地人读如“泥”是当地独有的一个地方字。地处新会城南不远的熊海中 正当西江入海之冲 居江口七岛的中央 梁启超曾说：“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据《新会县志》这里的气候“一岁之间暑热过半，冬无霰雪 草木不凋；一日之间 雨旸寒暑 顷刻辄易。夏秋之间，时有飓风，或一岁数发，或数岁一发。又有石尤风 其作则黑云翔涌 猝起俄顷。”其风俗，则士人尊师务学问，不逐虚名。仕者以恬退为乐 竞进为耻。尚门第 矜气节 慷慨好义 无所谄屈。境之西南多农鲜贾，依山濒海者，以薪炭耕渔为业。民无积聚而多贫，故其俗朴而野，其流弊

也犷而不驯。”有人说梁启超的性格为粗线条的阳刚雄壮型，而非细巧的阴柔优美型，这与他幼年所受家乡环境的影响有极大关系。

熊子乡内共有五个村庄 以茶坑村为最大。村东有山名熊子山，又名凤山，山上有塔曰凌云塔，又名 熊子塔或龙子塔。塔为七层 建于明代 至今完好 通体砖砌 垚以紫色 挺拔劲秀 状如铁笔，俗称文笔塔。乡间故老相传：有了这座文笔塔，才出了梁启超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大手笔！

凌云塔是梁启超少年时期常游之地。登上塔顶，凭栏四眺，视野开阔，风景如画。南望一水接天 即为崖门出海口。据梁启勋《曼殊室随笔》说：那里海上有大岩石突出水面，高逾五丈，名曰“奇石”石上原有擘窠大书 12 字曰“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盖即陆秀夫负宋帝昺(bǐng)蹈海处。原来公元 1276 年元军入临安，虏宋恭帝北去。宋臣张世杰、陆秀夫等拥益王赵昶(shì)、卫王赵昺沿海南走，立赵昶为帝。1278 年赵昶死，赵昺继，退至距茶坑村仅七里之遥的崖山。次年，降元将军张弘范率军进逼，张世杰将战船千余，缚以绳索，孤军奋战，以腹背受敌失败。陆秀夫负帝昺跳海死。张世杰集合溃军，准备继续战斗，遇飓风覆舟溺死，南宋至此灭亡。张弘范庆大功之告成，勒石

以自鸣得意，但在当地人心中却成了无耻之尤。明成化年间，知县丁积命工削其字。有赵德用题咏一首写道：“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崖山之下还有一座碧瓦红墙的慈元殿，奉祀帝后及死节诸臣，勒石之题咏甚多，其中不少充满强烈的民族情绪。如陈独漉一首说：“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厓(yá)波浪至今悲。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梁启勋《曼殊室戊辰笔记》又说：“高祖毅轩之墓在厓门，每年祭扫必以舟往，所经过皆南宋失国时舟师覆灭之古战场……舟行往返，祖父每与儿孙说南宋故事，更朗诵陈独漉《山木萧萧》一首，至‘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辄提高其音节，作悲壮之声调。此受庭训时之户外教育也。”梁氏先世自宋末由福州迁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会，两遭亡国之痛，再为南逃之民，而且皆由异族入侵所致，举族数百年栖于山谷，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除梁启超的祖父混上个小小的教谕之外，没有人做过清朝的官。他的祖父虽然不一定有明确的种族思想，但这种历史的积淀常浮现于胸中，传播于子孙。梁启超自小受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他与康有为在出身上

的不同之处。康家屡世做着清朝的大官，其伯族国器曾任广西巡抚，所以革命排满之意识无由发生。梁启超则一度倾向于排满革命，并最终与康有为分道扬镳，盖早种因于此。

故乡影响于梁启超的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这里地处县城近郊，离广州亦不远，距江门尤近。江门右扼四邑南路之要，左控江海之冲，早在明代已成集市；后来葡人占我澳门，江门的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成为“千艘如蚁集江滨”的“新市”；到了英占我香港之后，江门就成为与省、港鼎足而立的大市场了。江门很早就有火轮通行，到了光绪年间，由香港、澳门开往江门的定期班轮已有十余艘之多。这些火轮船进入崖门，经银洲湖溯江而上，登上凌云塔，便可一览无余。这类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使少年梁启超大开了眼界，所以当他16岁应举做《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这个文题时，破题一句就是“明莫明于千里镜，巧莫巧于火轮船”。

这里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孕育发展较早的地区。就在梁启超出生的那一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邻近的南海县创办了继昌隆缫丝厂，使用法国式之器械制丝，厂内有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

获厚利。影响所及，三四年间，南海、顺德两邑相继而起者多至百数十家。不久，江门也出现了两家使用足踏器，拥有女工七百人的缫丝厂。在新会县城东南、距茶坑村不过数里的三江人赵鼎三，也自出心裁，以木杂铁轮制成织布机，可用汽力或牛力，以数十织布机相属，一转而各机皆动，成布异常敏捷。但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从一出世就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旋起旋落，备受摧残。上述赵鼎三的织布厂，以及新会荣昌火柴公司，江门天利机器缫丝厂等新兴民族工业，因无力与洋货竞争，不久就被扼杀于襁褓之中。

看在眼里，印在心上，这些不能不引起热爱祖国、思想敏锐的少年梁启超的深思。这深思的痕迹在他 11 岁所作的一首《登塔》诗中已露端倪，诗中说：

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
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
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
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
此理终难得。

这首诗 1983 年由广东著名书法家秦萼生手书，上石刻碑，立于凌云塔下，供游人观赏。诗中问天、问

孔，而且表示了某种怀疑，在当时未免惊世骇俗，难怪他的祖父看了后对他大加训斥：“你敢冒犯苍天、孔子，大逆不道！”但是它不仅初步显露了梁启超的惊人才华，而且表现了少年梁启超勇于探索 and 进取的精神。他曾对友人说：“余自少抱改革政治的决心。”以后他热心向西方学习，积极探求救国、富国、强国的道路，亦早种因于此。李大钊在挽孙中山长联中说：“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子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可谓言简意赅，深刻之极。近代影响巨大的先进人物洪秀全、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都出生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带，绝非偶然。

当然，对梁启超影响最直接、最深刻的还是他的家庭。他的祖父、父母的言传身教，对他一生性格和学业的养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启超的曾祖有几亩田，后来分给了八个儿子，每人平均仅得几分。启超的祖父中秀才以前靠种田过活，半耕半读；中秀才以后，买了十几亩田，随即均分给他的三个儿子。到启超父亲这一辈，经济情况在乡中属于中等。他也是半耕半读，在启超中举人以前，家中的几亩田全由他父亲自耕。启超幼年，甚至中了秀才以后，除读书外，也要参加劳动，

有时偷懒，便遭到父亲的训斥。按当时风气，中了秀才，即可到祠堂拿津贴，并可在乡间坐馆教书，多不肯下田。惟耕读人家，则以劳作为美德，借以保持其淳朴家风。

梁氏迁于新会，十世为农，到启超祖父始肆志于学。但是他在科举道路上奋斗了一生，只考中个秀才，援例捐作副贡生，选教谕。教谕是主管一县文教的官，只有八品，何况他还未曾正式到任，连个八品官还没真正做上哩。不过，这倒给他留下了教诲自家子孙的条件和时间。

祖父名延后，字维清，号镜泉，生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兄弟八人，友爱甚笃，好学问，书法学柳公权，刚健婀娜似犹过之。梁启超书法兼容欧柳，大约就是乃祖遗风。梁启超非常崇敬他的祖父，曾向人概括其行事说：“勤俭朴实，其行己也密，忠厚仁慈，其待人也周，其治家也严，而训子也谨，其课诸孙也详而明”。这位老先生及见之孙亦八人，而尤爱启超。启超三四岁时就跟着祖父睡，风晨月夕，寂寞黄昏，这位崇尚宋明儒义理气节的老人就给稚孙讲解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崖山遗恨，扬州十日，嘉定屠城，自然是最有趣的话题。此外，茶坑村原有一座北帝庙（今已不存），庙中珍藏古画

四十八帧，乃工笔绘历史上二十四忠臣、二十四孝子。每年灯节，必悬挂十余日。祖父每携诸孙入庙，为之一一讲解：“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老人还手书一联，悬于故居厅堂。联曰：“周岁三百六旬，屈指计朝；试问烟景阳春，一年有几。屏开四十八幅，举头看望，也知忠臣孝子，自古无多！”这些历史上的“忠臣孝子”的嘉言懿行，尤其是那些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艰难岁月里矢志抗敌、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的不屈精神，深深地激动着儿童时代的梁启超。这些，加上每年祭祖时的“户外教育”，培育了梁启超的进取精神和爱国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埋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

启超的父亲谱名祥徽，宝瑛，号莲涧，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弟兄三人，排行最幼，因此最见钟爱。年轻时亦治举子业，多次参加考试，连个秀才也没考上，乃绝意进取，在乡间设塾授课，其实也不过召集数儿陪伴启超等读书而已。他对启超等要求极严，本人又极仁慈方正，在乡里间热心排难解纷，苦口劝息赌盗械斗之风，好像是现在乡里的调解委员一样，很有些威信。毛以亨《维新奇士梁任公》一书说：“任公之好为改良派，盖为其乡绅家风之遗传。故其调和精神与革命精

神常相矛盾，亦潜伏于其先天之禀赋。”

启超的母亲姓赵氏，祖父是举人，父亲是庠（xiāng）生 幼承家学 颇通文墨 出嫁后 以贤孝名于乡里。母亲对小启超的教育和影响，则有他的《我之为童子时》一文为证：“我为童子时 未有学校也。我初认字，则我母教我……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话，斯断不饶恕。我六岁时，不记因何事，忽说谎一句，所说云何，亦已忘却，但记不久即为我母发觉……晚饭后，我母传我至卧房，严加盘诘……当时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我母当时教我之言甚多……但记有数语云：‘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当为之事，而我为之，畏人之责其不应当为而为也，则谎言吾未尝为。或者有必应当为之事而不为，畏人之责其应当为而不为也，则谎言吾已为之。夫不应当为而为，应当为而不为，已成罪过矣。若已不知其罪过 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 或他人告之 则改焉而不复如此矣。今说谎者，则明知其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 且自欺欺人 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说谎话之

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训 我至今常记在心 谓为千古名言。”

小启超在祖父、父母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下长大，在学业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起初跟母亲学识字 3、4 岁开始读“四书”、《诗经》；5 岁以后父亲教他中国略史 读完“五经”；7 岁学作文，8 岁就能写上千字的文章；11 岁考中秀才。梁启超在 7 岁前即读完四书、五经，除了要有过目成诵的速度和记忆力外，还要有超人的理解力，真可谓神童之尤。11 岁能考上秀才，也是科举时代罕见的事。

尤其突出的是，好像这些书还不够他读，因为他颇喜词章，祖父、父母便经常教他唐诗，他则嗜之过于八股。他们家境并不富裕，虽是读书人家，却没有多少藏书 只有一套《史记》和一套《纲鉴日知录》 祖父和父亲每日讲授 他边读边背 到 30 岁时，《史记》之文尚能成诵者八九。后来别人又赠送一套《汉书》和《古文辞类纂》 也很快就读完了。

有人认为，近代学《史记》最有成绩的当推王闿运、梁启超二人。不过 王闿运的《湘军志》刻意摹拟 不啻为《史记》的翻版 颇嫌食古不化。梁启超则取其神而遗其迹，把《史记》夹叙夹议的形式运用到新文体中，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小启超聪颖好学，才思敏捷，在乡间传为美谈，至今人们尚津津乐道。启超童年时，有一天，他在厅堂爬梯子，祖父怕他摔倒，连忙扶梯护卫。启超看到这情景，天真地说：“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祖父听了，愕然而惊喜。又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客人，父亲命他奉茶待客。客人早闻启超才名，想趁此机会试试真假，于是接茶后喝过，出联要启超属对。曰：“饮茶龙上水。”启超不假思索，应声对曰：“写字狗扒田。”“龙上水”的意思是一口气把茶饮尽；“狗扒田”是指写字不讲规则，乱写乱画。两句都是当地乡间俚语，对得工整贴切，客人听了，极为佩服。启超6岁时在私塾读书，一天塾师出联命对，上联曰：“东篱客赏陶潜菊。”启超思索片刻，应对曰：“南国怀召伯棠。”召（shào）伯一作召公，名奭（shì），曾佐周武王灭商，被封于燕，成王时任太保。相传召伯巡行南方时，曾在甘棠树下休息，事后人们把树保护起来，不准伤害，并名之曰“召棠”，以示怀念。后来人们使用“召棠”或“甘棠”称颂地方官吏之有惠政于民者。梁启超用这个典故来对晋朝陶渊明清逸的高风，塾师听了，甚为嘉许。

9岁的梁启超，就学于设在县城的周惺吾塾馆。有一天，父亲来城，带他前往友人李兆镜秀才

家里商议赴广州应府考的事。李秀才家住会城双孖塘（今骑虎西十九号）门前庭院种有杏树，故门墙镌石曰“杏园”（刻石今仍存）。梁启超和父亲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启超起床出庭院，看见园中杏花盛开，楚楚逗人，他便攀折了一枝抚弄玩赏。正在这时，屋里传来脚步声，启超怕碰上主人，有失观瞻，忙将杏花藏在衣袖里。但是他这番小动作，给屋内的父亲看在眼里，于是便罚他应对。出联曰：“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启超抬眼看见屋内厅堂中有块“挡煞”的小铜镜，触景生智，便对曰：“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父亲听了，觉得满意，才饶了他。这事给李秀才知道了，也想趁机考考小启超，出联曰：“推车出小陌。”启超不假思索，顺口对曰：“策马入长安。”李秀才听了，大赞“神童”不已。

清光绪八年（1882年），启超年方9岁，在父亲的陪同下赴广州府应童子试。那时未通客轮，有一班应试的人结伴雇舟前往。一天，士子、塾师、家长们在舟中共膳，有人见启超年纪最小，又久闻他的才名，便想试试他的才学。于是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指着菜盘中的咸鱼为题，叫启超作对。启超凝神片刻，应道：“太公垂钓后，胶鬲（gē）举盐初。”太公即姜太公，胶鬲亦殷周时人，原为纣臣，遭纣之乱，

隐遁为商，周文王于鱼盐贩子之中得其人，举以为臣。梁启超以姜太公钓鱼和胶鬲贩盐的故事印证咸鱼的由来，口气既大，学问亦博，众人听了，都非常佩服，以至“满座动容”；“神童”之名，自此益著。

草堂求学受益深

少年梁启超虽然聪颖敏悟，才华横溢，但仍同他的祖、父辈一样，终日在科举这条死路上奔波，把主要精力用来钻研帖括。帖括是一门专为应付科举考试的学问，源于唐代。那时的一种考试形式叫做帖经，“帖经者，以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后以应试者多，所帖愈难，应试之士，将难记之经总括编为歌诀，熟诵之，以便记忆，称为帖括。后世亦称科举应试之文曰帖括，明清两代曰八股文，亦称时文。对于这种枯燥乏味、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的东西，梁启超虽然心里不喜欢，但是当时并不知道天地间于帖括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学问。他的父亲几次应考，都没考上，大概对这门“学问”也缺乏自信。所以在他 9 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县城，入了周惺吾的塾馆。梁启超不负家长的重望，11 岁上便考中了秀才，周先